

圣·奥古斯丁基督教神学历史观初探

安 庆 征

圣·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历史观在西方历史观念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整个中世纪基督教史学的理论指导,而且对近代西方历史哲学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克罗齐、科林伍德、巴特菲尔德等都曾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圣·奥古斯丁的基督教历史哲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历史观念,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奥古斯丁甚至被某些西方学者誉为“历史哲学之父”^①。而我国史学界对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历史观或斥为荒诞不经的宗教迷信,或贬为极端唯心主义的说教,总的来说是否定得多而肯定得少。故本文拟对奥古斯丁的神学历史观进行初步的评述。

奥氏从413至426年,历时13年撰写的《上帝之城》一书,是一部系统阐述基督教原理和神学历史观的著作。严格说来,《上帝之城》并非历史哲学专著,而是一部神学专著,但奥氏为了建立起一个能适应新形势需要的神学体系,回答现实提出的罗马城陷落原因问题,以上帝的意志来解释世俗历史,就不能不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作出相应的说明,提出自己的神学历史观。虽然,奥古斯丁本身对古典文化有很高的素养,但他却不愿亲自去处理那些繁琐的世俗历史的资料,而是让他的弟子、西班牙教士克罗斯乌斯帮助整理这部著作的资料。

《上帝之城》全书共22卷,至今未有中译本。根据其内容结构,全书明显可分为两大部分。从第1至第10卷为第1部分,主要

叙述罗马人的历史和宗教,论证罗马城的陷落是由罗马人自身的罪孽造成的,并驳斥异教徒的指责和种种不符合基督教原理的“异端邪说”。

1至5卷,奥古斯丁回顾了基督教列为国教之前,罗马人信仰旧宗教诸神时所遭受的各种灾祸。指出罗马城建立之始就由于罗慕洛杀害其兄弟勒莫斯而犯下罪恶。罗慕洛就相当于《圣经》中那个弑兄弟者该隐,由这种恶人建立的罗马城邦当然会后患无穷。罗马城受到毁灭,如同该隐受到上帝的惩罚一样是合乎情理的。到了罗马帝国时代,罗马人的行为举止已经败坏,灵魂也已经堕落。这种堕落是所有灾难中最严重的,终于导致了帝国的倾覆。6至10卷则从道德哲学的角度分析善恶。批判罗马人迷信鬼神、恣意纵情于淫乐之中,不免受到惩罚。他还极力鼓吹柏拉图主义和斯多葛派的幸福观,称赞新柏拉图主义关于人类得救的理论同基督教的“救赎论”很相似,柏拉图《蒂迈欧》中关于灵魂不死、神的创造和永恒真理的问题,同《圣经》的论述相吻合。极力贬低古希腊朴素唯物论者泰勒斯、伊壁鸠鲁等人的哲学观点。

第2部分从第11至第22卷,是该书的主要部分,着重论述“上帝之城”和“人间之城”的起源、发展和命运。他的基督教神学历史观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在第11至

① 《美国大百科全书》1980年版,第8卷,第962页。

第14卷中,奥古斯丁首先借《圣经》中“上帝之城”这一概念进行发挥,认为在“上帝之城”这一天上王国、上帝的精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与“上帝之城”相对立的“人间之城”。然后,又根据《创世纪》中的说法,叙述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听从恶的天使的引诱,违背上帝的禁令,忍不住食欲的诱惑,吃了“禁果”,犯了“原罪”,以后又株连整个人类,形成以善的上帝为一方,恶的人类为另一方的两种城国的对立。“两种不同的爱形成两种不同的城国:地上的国度爱自己乃至蔑视上帝,天上的国度爱上帝乃至蔑视自己……地上的国度靠威严统治诸王和各族,天上的国度君臣互爱,君王体恤全体臣民,臣民乐于服从”^②。

15至18卷中,奥古斯丁用较大的篇幅叙述神的历史的主要阶段,解释了《创世纪》中所记录的从该隐和亚伯拉罕的时代至洪水的事件,叙述了两个城国的成长与发展。

19卷专门叙述关于和平的理论。20至22卷叙述世界末日和最后的审判。指出“上帝之城”注定同上帝永世长存,而“人间之城”注定同魔鬼受苦。“上帝之城”必胜,“人间之城”必败。纵观全书,我们可以看出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历史观的主旨所在:1.上帝至高无上、创造一切。上帝的意志显示在世界的万事万物之中。无论是自然界的鸟树花虫、江河湖海,或是人类社会的大千世界,一切都来自上帝。这是奥古斯丁观察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出发点。2.上帝主宰安排一切。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上帝意志实现的过程,是“人间之城”和“上帝之城”不断斗争的历史。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的或即将发生的每一事件,都不过是实现上帝意志过程中的小插曲。奥古斯丁从他的善恶二元论出发,认为“上帝之城”由上帝决定得救的选民们所组成,“按照精神生活”,向往善良追求永生;“人间之城”由那些放纵欲望的人们所组成,“按照肉体生活”,贪图现世享受,

犯罪作恶。但善是无法抗拒的,人类历史的归宿是善战胜恶。“人间之城”不可避免地要以“上帝之城”为楷模,最终归结到“上帝之城”。3.世人所了解的两种“城国”只是一种混合状态,而非纯粹形式。“上帝之城”不可能以一种纯粹形式存在于世间,甚至那个将在地上建立的“千年天国”也包括俗人与圣哲。因此,基督徒研究历史必须选择并理解那些与“上帝之城”的地位息息相关的事件。例如:罗马史上马略与苏拉之间的斗争对基督徒而言就毫无意义,而君士坦丁大帝同他的反对者之间有关承认基督教合法地位的斗争却至关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上帝之城”在世间的进展。4.“人间之城”不断变化,既无意义又无稳定性可言。每个城邦和帝国在完成了历史使命之后就会永远消失。罗马帝国虽然有传播福音之使命,而将所有人们联合起来,也不能逃脱衰亡的命运。基督徒只有从“上帝之城”中期待历史上的稳定和秩序。因此,基督教史家必须使用神学传统的分期法。奥古斯丁没有采用达尼尔(Daniel)四个世界帝国的构想,而是另辟蹊径。在他的《论三位一体》这部著作中,他曾经提出一种三段分期法,将整个历史分成:无法律时代、法律支配时代与上帝光辉照耀时代^③。在《上帝之城》这部书中,奥氏又以基督诞生为界标,将基督诞生前后的人类历史划分为黑暗与光明两大阶段,并力图从这种演变中找到可以理解的原则。把过去划分为两大阶段后,他再加细分,用人这一有机体的成长和衰落来比附历史,将人类历史又分为婴儿时期、孩童时期、少年时期、青年时期、壮年时期、老年时期六个时代,并与基督教所宣扬的神的历史相对照。婴儿时期相当于从亚当至挪亚时期,

^② 引自R·M·哈特金斯主编:《西方名著选集》,980年英文版,第18卷,第397页,奥古斯丁:《上帝之城》,XIV28。

^③ [美]恩斯特·布雷萨赫:《古代、中世纪近代史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6页。

孩童时期相当于挪亚至亚伯拉罕时期，少年时期相当于亚伯拉罕至大卫时期，青年时期相当于大卫至“巴比伦之囚”时期，壮年时期相当于“巴比伦之囚”至耶稣基督降生时期，老年时期相当于耶稣降生至耶稣再次降临人间。

奥氏认为在人类历史的第六个时期即老年时期，产生了基督教。这就是说基督教时代是人类历史的最后阶段，罗马帝国后期，人类历史已临近末日。基督教会的产生标志着尘世的即将毁灭，但却宣告了人类的再生，

“一个古老的肉体的人的衰朽伴随着一个新的、精神的人的诞生”^④，人类将在“上帝之城”中得救。奥氏的这种看法，实际上是现实的罗马世界在他头脑中的折光。在他生活的时代，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帝国在奴隶起义和蛮族入侵的打击下倾覆了，统治阶级中的许多人感到绝望，纷纷加入基督教，以求取得精神上的安慰。这就是奥古斯丁所说的尘世的毁灭，与人类在“上帝之城”中的再生。5. 宣扬教会的权力应高于世俗的权力，教会必将统治全世界。奥氏借“上帝之城”的概念，提出“神权至上”论。他认为国家是由社会交往而联合起来的人群的组织，是一种力量的统治，无真理可言。只有“上帝之国”拥有真理，在“上帝之城”完全取代世俗国家之前，“上帝之城”先在教会中实现。因此，基督教会虽然属于俗世，但在本质上高于世俗国家，世俗国家应该接受它的领导，按教会指示办事，为上帝服务，以便完成人类的历史使命，等待天地末日的来临。

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历史观宣扬上帝创造一切、安排一切，“上帝之城”是人类历史的最后归宿，无疑是十分荒谬的。但是，如果我们仅仅简单地把这样一个完整的基督教神学历史观斥之为荒唐透顶的说教、奴隶制灭亡之前的反动叫嚣、以宗教迷信取代古典史学的信史实录、科学求真，亦是失之偏

颇的。恩格斯曾经这样评价基督教：“对于一种征服罗马世界帝国，统治文明人类的绝大多数达1800年之久的宗教，简单地说它是骗子手凑集而成的无稽之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根据宗教借以产生和取得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去说明它的起源和发展，才能解决问题。”^⑤我认为，这也是我们评价奥氏基督教神学历史观所应持的态度。重要的是我们应考查它是否提供了某些前人未涉及过的新东西，对以后历史观的发展是否产生过某些有益的启示和影响。

首先，奥氏在他的基督教神学历史观中提出了一个系统完整的“人类大一统”思想。基督教思想中原来已有“天上地下一切最后终归于一”^⑥的看法。早期的基督教史家也认为：某一地区、某一国家、某一民族的局部的特殊的历史不符合基督教的原理，不能阐明上帝意志在人类生活中实现的过程。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是平等的，没有什么特殊的种族和阶级，没有那个人类集团的命运比其它集团更重要。所有的人和所有的民族都包罗在上帝目的的规划之中，历史过程在任何地方和一切时间都属于同样的性质，它的每一部分都是同一整体的一部分。基督教要求这样一部世界通史，一直追溯至人类的起源，叙述世界各民族的产生，如何分布到全球各地居住，然后谈到各种文明的兴衰和各种政权的更迭，最终归结到上帝意志的实现，其主旨将是上帝对人生目的的普遍开展的通史。奥氏在《上帝之城》中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详尽的发挥，他所叙述的世界通史无疑最符合这种要求，可以说是集早期基督教史家“人类大一统”思想之大成。奥氏认为《圣经·旧约》不仅是预言和信条，而且是真实的历史。他从《创世记》出发，作为人类的

④ 同②，《上帝之城》XVIII。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8页。

⑥ 叶秀山等：《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23页。

起源，以“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为发展线索，创立了一个全人类在基督的启示和“神恩”庇护下，走向天国一个完整的世界通史体系。抛开这种世界通史体系的神秘色彩，这种普遍的历史观念，突破了古典史学中以希腊罗马为重心的特殊主义，克服了希腊、罗马的地域观念。自亚历山大的东征至罗马帝国的建立，地中海沿岸地区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开始成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波里比阿、李维等著名古典史家已具备“通史”眼光，但他们未从哲学高度来把握整个人类的历史，归根结底仍未跳出城邦史、帝国史的窠臼。正是从奥氏开始，历史学才从城邦史、帝国史孤立狭窄的格局中走出来，普遍意义的世界通史由此出现。当然，在奥氏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人们的眼界还不可能扩大到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世界的范围，但这种历史观毕竟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新的思维方式成为以后“世界史理论继续发展的沃土”^①。使历史学家在选择历史事实方面扩大了范围，促使历史研究向着整体性发展。

其次，奥氏的神学历史观包含一些历史发展观念的因素。奥氏把整个人类的历史看成善与恶、“上帝之城”与“人间之城”相互对立斗争的历史，看成是在基督教的引导下走向天国一个发展过程。奥氏认为：由于人一生下来就继承了“原罪”，因此必然贪图享受、犯罪作恶，但他又指出：世俗事物本身并非恶，因为上帝没有创造任何罪恶。如果上帝没有预见到以后他会通过恶来取得一些善，他就不会容许恶的存在。爱世俗生活不是恶，真正的恶不在事物本身，而在于人的欲望的行动和选择，当人们把本应奉献给高尚事物的爱赋予低级事物之时，恶就产生了。生活黑暗的一面不过是图画上的暗影，通过对比来加强整个画面的美感。这就是说善是本质的东西，占有绝对优势，恶只是善的缺乏，善必然会战胜恶。当然，奥古斯丁

的善恶二元论是有其阶级内容的，所谓善也就是服从教会，服从现世生活中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这无疑是荒谬的。但他把善看作矛盾的主要方面，恶为矛盾的次要方面，善和恶的斗争决定着人类的命运，人类的前途最终是光明战胜黑暗，体现出一些历史发展的观念。

再次，奥氏的基督教神学历史观为以后基督教史学的纪年方法提供了理论基础。由于奥古斯丁提出的是一种普遍的世界历史体系，人类社会的历程是一连续发展、相互联系的整体，这就要求对一切历史事件都采用统一的编年结构和纪年方法。希腊人曾以奥林匹亚竞技会作为历史事件的分期，而罗马人则以执政官的任职作为历史事件的分期，自奥氏开始，这种各个国家分别采用各自特殊的历史纪年的方法就被彻底变革了。奥氏认为古希腊人那种时间发展的循环观念是错误的，只会把历史变成一种毫无目的周期性转换和无意义的重复。在他看来，历史事件的过程是有时间顺序变化的，而且这个时间顺序是直线发展。当然他的谬误在于认为历史的发展有一终点，最终回到天国，时间按直线发展是要实现上帝的目的。但相对而言，这种时间顺序按直线发展的观念，比希腊人的循环论是一种进步，有利于历史学家找出历史事件发展的来龙去脉，弄清事件之间的因果联系。奥氏将整个历史划分为基督诞生前后两个时期，然后再加细分，这样历史便被分成一些各有其自己特点的时代，使得每一件事在性质上都不同于前一时代发生过的事，这种划时代的概念，也是希腊罗马古典史家所没有的。奥氏的这些关于历史分期的观念影响到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家，如西班牙主教伊西多尔在7世纪创立的由基督诞生而向前或向后记录一切历史事件年代的统一纪年法，为以后世界各国历史纪年的统一，提供了一种简便的方案，影响是深远的。

① 科斯敏斯基：《中世纪史学史》东北师大历史系编译，第一讲。

最后，奥氏并不完全否认世俗世界的存在，在他论证上帝意志的实现过程时，也免不了要涉及世俗的历史。“当他戴着一种思想之冠，以一个世俗史家讲话时，他可以谈论古代异教徒的美德，当他戴着另一种思想之冠时，这些美德本身就on被描写为恶，用这种方式，他给世俗史一个地位。”^⑩因此，透过他的宗教外衣，我们可以看到一些饶有趣味的见解。

奥氏也去谈论人类命运的一些基本问题。例如：世界为何以及怎样发端？在此之前存在着什么？时间本身的性质是什么？人类仅仅是命运的奴隶吗？我们应如何对待人类的灾难？这些问题即使对今天的历史学家而言依然是发人深思的。他也提出了一些和当代史家所研究的课题很相近的一些问题。例如：文明在何处兴起？最初的罗马人为何获得巨大成功？它的继承者怎样建立了一个如此广阔的帝国？在回答这些问题时，除去基督教的色彩，他也提出了一些因果关系的观念。例如：他认为蛮族攻陷罗马之后的大肆抢劫源于他们好战的习俗。迦太基的陷落导致了罗马人纪律和道德的松懈、共和精神的衰落。尤其是他在谈到罗马共和国的扩张开始受到内战和各种社会问题的纷扰时，并没有说这是上帝的惩罚，而是由于罗马征服了

广大的地区，由于它自身的沉重负担而趋于崩溃。这在今天看来，也有些相对的客观性。

在论证善和恶的斗争时，他提出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认为世界上战争连绵不断，并不意味着人类不愿意和平，而是“渴望和平”，只不过是“企图通过战争来达到光荣的和平”。他痛恨战争，告诫人们不要忘记罗马帝国的和平是通过恐怖的流血和杀戮才取得的。“人间之城”虽说是恶的，但也表现为保卫和平，维护正义，体现着人们善的愿望。

他在人类历史的分期问题上，以人这一有机体为标准，将整个人类历史划分为婴儿时代、孩童时代、少年时代、青年时代、壮年时代和老年时代，对以后近代西方历史哲学中的“文化形态史观”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们对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历史观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旨在说明这种历史观对古典史学而言不只是一种倒退，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前进，它是那个时代西方人对人类历史重新探索和思维的结晶。

〔作者安庆征，河南大学历史系讲师〕

⑩ 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历史的起源》伦敦，1981年版第184页。

《辞海》对“国徽”条目解释不确切

· 张五勤 ·

《辞海》1977年版，第1756页上的“国徽”条目上说：“国家的标志。其图案和使用办法由宪法或专门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

而《新华月报》1950年10月号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说明：“国徽的内容为国旗、天安门、齿轮和麦稻穗，象征中国人民自‘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诞生。”应尊重原始注解才为确切。